

山西文史资料

第 60 辑

(1988年第6辑)

我所知道的阎锡山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

顾问	王西	姚奠中	郝树侯
主任	李蓼源		
副主任	乔志强	李裕民	张友
	姚文锦	韩秋云	
委员	刘子威	赵修身	尹世明
	贺德宏	李俊虎	罗广德
	马明	杨小池	张海瀛
	张豪若	刘纬毅	范仁贵
	曹秋恒	霍成勋	孙凤翔
	刘海清	叶昌纲	张正明
	史法根	翟品三	杨玉印
	刘存善	赵政民	霍军

主 编 李蓼源

副主编 赵政民 霍军 王艾权

目 录

侯外庐谈阎锡山	林 登辑 (1)
赵戴文和杨爱源谈阎锡山	陈光宇 朱崇廉 (9)
阎锡山乡居纪实及其它	阎云溪 (11)
我和阎锡山接触过的一些往事	温震东 (29)
关于阎锡山的琐事回忆	翟品三 (48)
我所见到的阎锡山	张正廷 (61)
回忆阎锡山的几次讲话	杨锡九 (65)
侍阎见闻杂录	祝秉钧 (70)
阎锡山讲收获哲学与上党地区	张荣汎 (72)
“六政三事”在介休	张 帆 (74)
阎锡山在广州	夏 风 (83)
阎锡山离晋去台始末	李蓼源 (106)
“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	刘存善 整理 (120)
西北实业公司创办纪实	徐崇寿 (160)
傅公祠的今昔	季 康 (199)

侯外庐谈阎锡山

编者按：侯外庐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1903年2月6日出生在山西省平遥县西王智村，自幼聪敏好学，1922年毕业于汾阳中学，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考取并就读于北京法政大学法律系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他1927年赴法留学，1930年回国后先后在哈尔滨政法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任教。

1924年，侯外庐结识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李大钊。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侯外庐由信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于1928年在法国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失掉党的组织关系，1951年重新入党）。早在1927年他就开始翻译《资本论》，1936年出版了我国最早的《资本论》第一卷全译本。从30年代开始，他就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1934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40年代，他陆续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苏联历史学界诸论争解答》等书，探讨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古代社会发展途径与古代思想的特点、近代社会的性质与启蒙思想的特色以及历史观与方法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末，侯外庐和他的合作者，进一步完成了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的撰著工作。这部著作对上下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历史与思想文化传统做了批判性总结，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侯外庐晚年虽然长期患病，但在学术上仍然孜孜以求。近十年来，相继出版了《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纲》、《宋明理学史》、《初的追求》等许多著作。他毕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著作宏富，为我国历史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

1932年冬，侯外庐在北平大学任教时与许德珩、马哲民宣传抗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即当时著名的“许、侯、马”事件，关押达九个月之久；后经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萨空了、张友渔等多方营救，以“因病假释”之名，出狱就医，避难山西太原。在太原期间他与阎锡山多次接触，对阎的思想和为人有所感受和认识。本文是从《初的追求》一书中摘录的。

阎锡山在蒋冯阎战争失败之后，于1930年底回到山西（按：《阎锡山日记》记载，阎从大连回山西是1931年8月），竭力标榜“民主”，网罗进步人士，宣扬他要走一条特殊的路线。我和一些朋友仔细分析了阎锡山的动向。综观他辛亥以来的行为和山西割据称霸的形势，我们认为，他既然抗不过蒋介石，就必然坚持在山西经营独立王国，当土皇帝。山西在华北的战略地位，自古就十分重要。“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当土皇帝的宗旨不变，而对日军的态度却相当暧昧。我决定回山西去，利用阎蒋矛盾，利用阎锡山标榜“民主”的口号，相机寻找一个新的宣传抗日、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阵地。

到了太原，阎锡山的官方，只限李冠洋、张隽轩和我往来。李冠洋是我在二十年代北京法政大学求学时就认识的。那时，他是国共合作运动的参加者，此时，已成为阎锡山的亲信，正不遗余力地在为阎锡山搞一个叫做“青年救国团”的省内组织（按：

《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记载，该团叫“中国青年救国团”，在山西、绥远、北平等地活动。张隽轩，是我到太原后初识的。他的舅父杨爱源是阎锡山的副司令，因有这种关系，他尚能得到阎锡山的信任。张隽轩为人朴实、正直、不苟言笑，思想很进步。相识以后，我感受到他对我十分诚恳，虽说他的身份是阎公署的人，但他的作风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我在太原期间，与他过从颇密，相处得很知己。直到太原失守后，我们在临汾办学时，突然听说阎锡山发现张隽轩是共产党，恼羞成怒，密令逮捕，张隽轩闻讯逃离，径直奔晋西北抗日部队而去。从此，在我的心目中，对他更增加了许多敬意。

尽管有种种限制，阎锡山政权总还无法禁止我与旅法时的同学、好友周北峰（时为共产党员）往来。周北峰当时在山西政法大學任教，经他介绍，我又认识了从德国回来的杜任之。杜也是共产党员，在太原绥靖公署任秘书。他们都在利用各自的合法身份为党做工作。当时，我除了因为旅法时的职务关系，了解周北峰是共产党员外，对其他人的政治面貌全无了解。交往深浅，全凭自己的感官直觉。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一踏进太原起，我能与之心心相印的，绝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

僻处太原，在不能从事任何直接有益抗日工作的情况下，我总感到孤寂，感到茫然。阎锡山这个人阴险奸诈，诡计多端。自知书生气太重，在政治活动方面，既没有经验，又缺乏智谋。于是，我尽量推动张隽轩、李冠洋引更多的革命者来晋。他们根据各自的目的，说服了阎锡山。继我之后，于1934年一年中，先后又请来了张友渔、韩幽桐、邢西萍（徐冰）、张晓梅、杨绍萱、温健公、黄松龄等一批共产党人。此外，还先后请来邓初民、许德珩、张申府、王思华等进步学者入晋讲学。

他们的到来，迅速打破了山西知识界的沉闷空气。这些同志大都是留学生，可谓人才济济。当年冬天，张友渔、邢西萍、杜

任之、周北峰、温健公等同志，一起发起组织“中外语文协会”，对外开办英、德、法、日等语种的补习班，通过补习班，团结、教育了许多革命青年。

阎锡山自辛亥时代起，始而投机革命，继而卖身于袁世凯，依附段祺瑞，一步步独揽了山西的政治、军事、财政大权。经过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确立了个人在山西的独裁统治。他一贯注重自身的经济实力，从烟土专卖到大办军火工业，无不环绕一个目的——增强个人实力。

蒋冯阎战争以冯、阎失败告终。阎锡山没有得到蒋介石政权的认可，在日本人的护卫之下，抢先从大连飞回山西。若不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他难免于一场蒋介石、张学良的武力制裁。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后，蒋介石出面调和了与各大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阎锡山受蒋政权委任，当上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管辖山西、绥远两省。此时的阎锡山，一方面不得不就范于南京政权，另一方面，他的地方实力固然依旧，但毕竟是败将重返，还不得不拿出些新花招来欺骗人民。三十年代初，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恶浪冲击着中国，工农业凋敝，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觊觎华北。民族的危机，人民的灾难，反倒被阎锡山当作为沽名钓誉的机会。

就这样，阎锡山重返山西后，开始着手推行他那一套“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

所谓“物产证券”，是阎锡山企图通过货币改革来摆脱经济危机影响的措施。具体说，就是在他的独立王国范围内，实行一种资本位的地方货币制度。事实证明，其推行的结果，除了便于阎锡山集团任意剥削，更多地中饱私囊以外，老百姓只落得失去一切经济自由。

阎锡山的所谓“按劳分配”，是以“土地村公有”、“兵农合一”、“现代井田”作为前提的。他吹嘘这种“兵农合一”的“现

代井田”就是“农业社会主义”，“非特可以救中国，且可以救世界”。实际上，“现代井田”制是一种赤裸裸的农奴制，是对历史的公然反动，它反映了阎锡山政权的军事封建主义的反动实质。

如果说阎锡山的“物产证券”，是从二、三十年代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货币理论中，零拾拼凑而成的大杂烩，那么，他常挂嘴边的所谓“按劳分配”，则不过是他道听途说来的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学名词而已。

……阎锡山作为一个地方独裁者，既然新近折兵于蒋介石，且又面临经济危机、民族危机，为巩固地方统治，他想在政治上表现出比蒋介石多一点“民主”，在经济上有所标新立异。政治上为了表现出“民主”，使他愿意请一些共产党员、进步人士，来为其标榜所用；经济上为了标新立异，更使他想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这一方面的知识，国民党是一窍不通的，唯有共产党人可资请教。这就是阎锡山三十年代初大批请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入晋的背景。

另一方面，一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在蒋介石政权下无法容身，便利用阎锡山提供的机会，来到山西，进行“合法”斗争，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同时也保存了力量。由此可见，双方都出于利用的目的。

1934年9月（按：《阎锡山日记》记载，阎父于1934年12月逝世，“庐墓百日”应在此后），阎锡山庐墓期间，住在五台河边村（现改属定襄县）老家。他用汽车把我从太原接去，我才初见其人。就在这一次，他拿出他写的那本《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征求我的意见。我以一种书生姿态，表示我只懂《资本论》，不懂他的“理论”。

后来，我又和张友渔、邢西萍、杨绍萱、温健公、刘再生诸人一同去过几次，都是为了讨论《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的。我们这些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却又比较明确地表示不承认阎锡山的

“理论”与社会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我的对策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我只讲自己对《资本论》的理论认识。邢西萍（徐冰）则不同，他总敢于对阎锡山诬蔑共产党的言论，采取正面驳斥的态度，他说：“我的水平不高，就我所知，你批评共产主义的错误，并不如此。……”我们这种态度，搞得阎锡山没趣得很。

阎锡山经常津津乐道其“二的哲学”，曾让李冠洋给我们讲解“唯中论”，也请我们分别给他讲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我给他讲的就是《资本论》的剩余价值学说。讲的时候，自然有一种不得已对牛弹琴的感触，但也发现他听得很仔细，很用心。我这才知道，这个人表示要听《资本论》，不单是为了装门面，他还另有目的呢。讲完之后，他总不免恭维几句，而背地里，则恨恨地谓我为“马克思迷”，“难以为驾”。不过，他也确曾感慨地对我说：“以前有人告诉我，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其论而无其事。听你这么一讲，看来还是有其论也有其事。”我想，这大概是他在伟大真理面前，无可奈何的表示吧。

1935——1936年间，阎锡山发表过如《防共必先知共》、《共产主义的错误》之类的反动文章。倒确实可以看出，他请人讲马克思主义目的之所在，民主是假，防共反共是真。

我认识阎锡山的初期（1935年上半年）就感到，在他身上反映出来，他与蒋介石的矛盾仍然是相当突出的。

他相当看不起蒋介石，连蒋介石看王世杰、钱端升的《比较宪法》这本书，他都要耻笑，认为这是“给小学生看的”。当时，上海有一家小报登了一幅漫画，画面上三个军阀，蒋介石一手握手枪，一手托现洋；冯玉洋一手举大刀，一手抓窝窝头。阎锡山一手提一杆秤，一手拿算盘。有人谈到这张画，他洋洋得意地笑了，他总是认为自己比别人都高一筹。

有一次，许多人在一起谈古论今，我借评论曾国藩，大骂蒋介石师承曾国藩，一样的卖国求荣，终将成为中国历史的千古罪

人。阎锡山收敛了笑容，说：“你可以骂蒋介石，但是你不要骂曾国藩，我也是曾国藩的学生。”我暗笑他一语道破天机，不自禁地脱口而出：“所不同者，蒋介石是洋的，你是土的。”在场的和不在场的朋友们听说这段对话，都替我这种公然蔑视的口吻捏把汗。结果，阎锡山倒也不曾拿我怎样。因为那时候，阎锡山处处标榜一个“土”字，什么“土烟”、“土产”、“土货券”、“土货商场”……处处以土为荣。阎锡山的“土”，成了地方主义的别称，独立王国的代名词。想来，阎锡山对我的蔑视口吻并不介意，奥秘原来在此。

阎锡山在政治上以善弄权术著称，他有一整套的两面手法。无论从什么角度观察，我们都可以看出，运用“二的哲学”，是阎锡山统治手法的基本特点。大到确定一条政治路线，小至人员使用，他无不按照“二的哲学”行事。

随着日军侵略步步深入，以及陕北我党抗日根据地的发展，阎锡山面临着共产党、蒋介石国民党当局、日本帝国主义三种势力对他形成的压力。他在这三种相互对立、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根据“一切为了存在”的原则，提出“抗日和日”、“联共防共”、“拥蒋反蒋”的方针，用抗日的名义维护自己的反革命利益，借进步口号掩盖自己的反动宗旨。这是阎锡山在抗战过程中，大体贯穿始终的路线，也是一整套特别明显的两面派手法，特别突出地体现了“二的哲学”的反动本质。

阎锡山对其内部的统治，也采取大抵相同的两面手法。

阎锡山手下，同时用着两套人马。一套以邱仰浚为首，倾向南京势力，另一套以李冠洋为首，是本地势力。对邱仰浚派，他说：“对南京，咱们要靠。”对李冠洋派，他又说：“咱们与他们不同。”两派都觉得阎锡山是自己的后台，相互监视，互相充当特务，然后向阎锡山邀功请赏。阎锡山由此得到不少好处。

具体到使用人的问题，他更是公开表示，“使功不如使过。”

曾任平遥县长的孙焕仑，有严重的贪污行为被阎锡山掌握。孙焕仑跪倒在地，痛哭流涕，请求赦一死罪。结果，阎锡山不仅免其死，而且大升其官，先授以冀宁道尹肥缺，数年后，又将此大贪污犯擢升为省民政厅厅长。

无怪乎当时的人们得出结论，阎锡山之用人标准是“使贪使罪”。阎锡山确乎是用这种手段培植亲信的。

1935年夏天，阎锡山令李冠洋动员我们加入他的组织。同志们一致地采取了抵制态度。为此，张友渔夫妇重赴日本，邢西萍夫妇重返北平。而我，苦于一身债务和家累，北平的案子（指1932年12月北平许、侯、马事件）还维持原判，实在无处可去，只好与温健公等一起，以拖延来对付。

从此，我不愿再与阎锡山有往来，阎锡山也不愿再见我们。在此同时，以张慕陶为首的一批托派分子来到太原，与阎锡山沆瀣一气，还和山西特务梁化之勾结在一起。我的处境十分不利。于是，我索性关起门来读书著述，一面继续《资本论》第二、三卷的翻译，一面开始了向研究社会史和思想史的转折和过渡。

（林 登辑）

赵戴文和杨爱源谈阎锡山

陈光宇 朱崇廉

一、怎样向阎锡山提建议

1930年阎锡山逃亡大连后，杨爱源在太原南华门他的家里再次对我说：“向阎提建议，如果是你自己的主张，那就很难得到他的同意。他不问事情该办与否，首先向你提困难，三问两问就把你问住了。你的建议也就完了。”

1939年夏，赵戴文在秋林给干部们讲《易经》时，插了一段话。他说：“咱们会长是一位英雄。伺候英雄领袖，有伺候英雄领袖应该注意的地方。你想办一件事，单说办了有什么好处不行。你提出来，他先给你提几个问题，就把你问住了。怎么办呢？你不要直接提出该办什么事，你要想方设法从旁提醒他，等他自己说出该办什么事的时候，你赶快表示赞同，事情就可以办了。这样，即使有困难，他也会替你解决。”

（作者陈光宇，原任太原绥靖公署政工处
副处长，民革联系人士，1987年逝世）

二、不要动他的权和钱

抗日战争期间，我于1938年任第六集团军军务处长，后来阎锡山调我担任第二战区军务处长。我对军务处长的业务并不生

疏，但没有在阎锡山身边工作过，却对如何伺候阎锡山有些担心。于是去向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请教。那时，民族革命同志会已成立好几年了，人们习惯上都称阎锡山为会长。杨说：“会长给你甚，你拿上甚；会长不给你甚，你不要要甚。你千万不要捋（音luō）动他的权，也千万不要捋动他的钱！”这话我一直牢记在心。

1946年我在太原害了一次伤寒。痊愈之后，去见阎锡山。阎锡山说：“女人坐月子，男人害伤寒，都得好好保养，咱们还有些维他赐保命，你领上些吃吧！”他随手写了个条子，叫卫生处付给我100粒维他赐保命丸。一个方面大员，给一个中将处长批100粒丸药，这怕在历史上还是少见的。

阎锡山的军队编制，向来是两套。一套是报蒋介石用的，假的多；另一套才是真的。1948年，军务处副处长雷良如把编制秘密泄露了，阎把雷交给杨贞吉秘密处死了，把军务处任免军官的大权夺了过去，在他的侍从参谋室里成立了选官课，掌管军官的升迁递补。军务处从此成了一个办理公文的文书机构。可以说，我还是在“权”字上栽了跟头。

（原民革太原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朱崇廉
口述，刘吉人记录，朱已于1985年逝世）

阎锡山乡居纪实及其它

阎 云 溪

一、河边村主要人物与阎锡山的关系

河边村的头面人物除阎锡山外，当然是其父亲阎书堂（字子明）和其叔父阎书典（字慎五）了。阎父人称“老太爷”，阎叔人称“二老太爷”。乡人对“老太爷”多敬之，对“二老太爷”多避之或敬而畏之，不愿与之谋事。除此二人外，就以阎锡山的二表兄曲容静（字清斋）和族兄阎锡祚（字福斋）为主了。其姨父阎长卿小名阎六，也在其内。此三人是地方士绅，村人及附近各村民除以乡俗按亲朋关系称呼什么爷、老爷、伯、叔、舅等外，多以“先生”或“老汉”称之，如清斋先生、福斋老汉等。

阎锡山的族兄福斋先生聪明过人，精细能干，勤劳刻苦，精通农商及乡村一般的土木建筑的规划设计和施工管理。阎锡山在乡的公私建筑多依靠之。阎氏家族中人事无巨细，亦多与之商量或请教。外人亦多如此，故人多敬之。

二、阎锡山与曲清斋的亲密关系

阎锡山从小生长在外祖父家，与二表兄曲清斋自幼相处，情感深厚，赛过同胞骨肉。清斋祖传经商，为人正直不苟，对人与事，是非明确，通情达理。阎对其表哥，至为崇敬，更为信任，言听

计从，很少有违。凡属家乡亲友以及乡间诸事，只要清斋一言，阎无不听从，但政务方面的事除外。阎对其表兄之子女，均以自己的子侄对待。如对其表侄曲宪平、曲宪治、曲宪南、曲宪纯兄弟四人，均听其表兄言，中学毕业后即送日本留学，宪平、宪治、宪南学习商业，宪纯学习工业。曲宪治曾与我谈及他去日本的志愿是想住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但行前与阎说明时，即被严加制止，阎说：“咱家的子弟，怎么能拿上人肉换猪肉吃！”因而只得学商。“人肉换猪肉”的话是当时乡里老人们对当兵打仗免不了一死的一种说法。

阎的大表侄曲宪平归国后留在阎的身边，吃住都在衙门，主管阎的私人印鉴。凡属阎的重要批件或手谕，必须由曲宪平盖此印章，方能生效，其重要可知。二表侄曲宪治、三表侄曲宪南回国后，都任职于西北实业公司，并代阎经管部分私人商号和财产。四表侄曲宪纯，学业未完而遇上日本帝国主义发起侵略我国的战争，不得不提前回国。抗战期间，他留在河边父母身边。日本投降后，阎将他安排在阳泉矿务局太原办事处任主任，又兼任太原第二制药厂厂长，由阎的西医杨镇西请德国医生共同研制，用日本军部移交的若干鸦片烟土作原料，制成镇静药片，牟取暴利。

曲清斋祖传经商，又善经营，因而轻学及其他，对政治很少谈及。村里有不少青年受其影响及指教，以从商者居多，致学者甚少。他说经商可以赚钱，念书大学毕业连个工作都难找到，这是他的思想本质。阎福斋与曲清斋同一认识。因此对阎行政公务等事，与本村有关的从不干扰，即使至亲好友也绝不为之说情，深恐有碍阎之公务，有损阎之声誉。每逢春节，地方县官到阎府为“老太爷”拜年时，顺便也向曲清斋、阎福斋拜年致候。乡人有趁此机会请求代为求情说事者，均被严词拒绝，无一例外。所以，他们二人在村里的威信与声望为最高。在日军占领期间，曲清斋仍住河边村。后来阎驻晋西时，日本军部曾派人几次请其到。

晋西一行，转达日军劝降意愿，均被拒绝。日军软硬兼施，始终未能如愿。1947年冬至1948年春，太原正进行残暴的“三自传训”，在杏花岭体育场乱棍打死革命者和无辜群众，其状之惨，目不忍睹。曲清斋知道后，进衙门面见其表弟阎锡山，陈述情况及人们的反映，建议应速停止。阎听后说：“这是下边（指所属）少数人干的，你不要管，我也没法。”曲清斋回家后唉声叹气，闷闷不语。家人见之甚奇，次日才得知原为此事。

三、阎锡山归里省亲另作他谋

记得是1928年冬，阎锡山声言其父年老多病，应侍奉在侧，于是由北平回到老家河边村。随员不多，均住河边村文昌堡（又叫永和堡）私宅。北平日常公务，由阎的总参议周玘（子良）代为主持。

阎锡山于1929年元旦前回到河边村，村人都说荣归故里，耀祖光宗，回家清闲几日，千该万该。就在这几个月的“清闲”期间，他在河边与其表兄清斋、族兄福斋等共同商酌设立了河边村营业公社及为阎氏家族兴办的思远源两杂货铺。资本以阎锡山为主，曲清斋、阎福斋、阎长卿、曲梦虎等五六人为营业公社董事，由曲清斋负总责（有似今日之董事长，阎福斋、阎长卿似为常务董事），以河边村最可靠的曲治汤（四隆富）为营业公社的大掌柜，曲福治为二掌柜，刘宪彬、刘洋海为三、四掌柜。思远源的掌柜也是由曲清斋指定其本族曲吉隆冬为大掌柜，近邻王五隆为二掌柜。营业公社的成立，予阎同其至亲聚会以诸多方便。所有公私事务，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多在营业公社内商议决定。如在河边村北的滹沱河上修建了一座青石礅洞的大石桥，便利了两岸几县人民的交通和运输，实现了乡民多少年来的愿望，同时又新开了一条“己巳渠”，利用滹沱河水经定襄至河边村，灌溉河边

村的官道地，开创了河边村渠水浇地之始。同时，阎又秉父命在河边村偏西南方大道东（东院街）建筑了阎氏祠堂。上述工程，除有山西省工程处处长李其昌参加外，主要是由阎请其表兄清斋和族兄福斋详细规划，精打细算进行的。营业公社和思远源两商号，在是年利用阎的势力派刘洋海和王五隆到天津购买了大批的呢绒、布匹、绸缎、洋广杂货及胡椒、大料、食糖等，借用铁路免费火车和公家汽车运回河边零整批发，赚了惊人的钱财。附近几县的商人，多在背地怒骂。

四、请冯玉祥来晋共谋国是

1929年夏秋之季，随阎驻在河边村的官员日见增加，营业公社后院的客房经常不断地招待着负责主管财务、兵工、军火及其他接近阎的军政主要人员。继之阎设行营于私立河边川至中学校内，阎的副官处、交际处、财务处等亦有负责人员到来。多方宾客和阎的僚属往返于北平、太原、河边间不绝于途，太原与河边村每日亦有值班大小汽车往返。这时，河边村一时成为军事政治之中心，全国都在注视着。同时也给河边村带来繁荣，当地商贩莫不喜欢。

1929年，冯玉祥讨蒋失败后到华山读书，于6月16日电阎锡山愿出国考察。6月21日阎复电冯玉祥请来山西共商国是，愿与一同出国。冯玉祥接电后，即由潼关渡河。阎锡山亲到晋南欢迎，经太原转到河边村，先住河边村附近大建安村阎的岳叔徐一清（字子澄）私宅。不多日，就移居于大建安村附近、滹沱河南的西汇村乡间平房，即人们所称的西汇别墅。当时只在计划，虽已由阎的内弟徐玉峰初步种树修山，但未具规模。大体观之，还是荒山秃顶。

冯玉祥先生来后，阎在西汇、建安至河边一带，加强了警卫。